

外出务工对民族混居农村的影响

社会
2010 · 3
CJS
第 30 卷

来自内蒙古翁牛特旗农村的调查

马 戎

摘 要:近 20 年来,“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城乡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现象,上亿农民进城务工与生活不仅极大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调整了城市人口的年龄结构,推进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同时也有力地改善了农民家庭的收入。但目前学界的研究偏于宏观分析和对“迁入地”的调查,对“迁出地”的调查相对较少。本文以内蒙古自治区半农半牧区的 26 个自然村的户访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当地外出务工人员的基本情况、结构性特征及务工活动对当地农户收入的贡献,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细致地认识和理解农村的外出务工现象及其对农民生活的影响。

关键词:人口流动 外出务工 结构性特征

The Impact of Leaving Home for External Employment on the Ethnically Mixed Rural Communities: A Field Survey of the Villages in Wengniute Banner, Inner Mongolia, China

Ma Rong

Abstract: In the recent 20 or so years, “peasant workers” have been a significant part in China’s rural and urban economic activities, having become a social phenomenon. Millions of peasants entering cities to work and live there have not only powerful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y but also helped balance the age structure of city populations, progressed urbanization in China, and greatly raised the incomes of peasant families. With China’s institutional reform continuously going deeper and her economy being on the rise, the volume and quality of such “peasant workers” will certainly improve in the future. Naturally, investigation of this “peasant workers” phenomenon has attracted the

* 作者: 马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Author: Ma Ro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E-mail: marong@pku.edu.cn

academic attention in China. However, most studies have been directed toward the “immigrating” locations at the macro-level; relatively few studies are focused on the “migrating” location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field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the households in 26 villages in Inner Mongoli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sic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ose who left home for external employment, their structural properties, and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ir local households’ incomes. This study may help us acquir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asons behind the phenomenon of leaving home for external employment in the rural areas and its impact on the local peasants’ lives.

Key words: leaving home for external employment, migration, structural properties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我国农村全面推行生产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以来,广大农村牧区的社会与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家庭联产责任制使每户农民有了长期享用使用权的耕地,可自由安排劳动时间和进行自主经营。随后城镇体制改革使政府放松了对人口流动和就业的限制,改变了城镇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和就业体制,这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提供新的机会。在这样的形势下,“农民工”成为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特有的现象和学者媒体研究讨论的热点话题。

近年来,对进城农民工的研究已经成为我国许多学科的重点选题,目前发表的有关农民工的研究成果有不少是政府数据分析和宏观趋势展望(蔡昉,2007;魏津生,2002;尹志刚等,2008;邹兰春,1996;辜胜阻等,1994),实地调查研究绝大多数是在农民工就业的城镇进行的,用人口学的专用术语讲,就是在流动人口的“迁入地”开展的。相比之下,对“迁出地”开展实地研究比较少。

本文是在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的一个半农半牧、蒙汉混居地区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自 1985 年以来,笔者在这一地区先后进行了多次不同专题的社会调查,涉及的专题包括人口迁移、族际通婚、居住格局、进镇迁移以及镇政府组织等(马戎,1989、1995;马戎、潘乃谷,1988、1989、1993;马戎等,2000),对当地的自然生态、社会组织、经济结构、族际交往以及农民生活等都比较熟悉,这些调查活动都得到了当地基层政府的大力支持。2005 年当我们考虑对农村经济和人口流动进行一次问卷调查时,又把这一地区选作调查地点。这次调查问卷的

内容涉及面很宽,但本文将集中对外出务工人员的有关数据进行分析,希望能够借助于这个典型的半农半牧区的调查资料,使我们对北方民族混居农村外出务工现象有具体和量化的认识和分析。

一、人口迁移研究的关注点

自从欧洲开始工业化进程之后,与二、三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现代劳动力和人口迁移就成为社会学和人口学的重要研究领域。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欧洲经济的复苏和全球化进程的启动,人口迁移成为继生育研究、死亡研究之后的第三个人口学核心领域。按照人口迁移研究的基本思路,在分析一个人、一个家庭或一个群体的迁移行为可能对社会带来的影响时,一般关注与迁移行为相关的三个方面(Thomas, 1968:298-299)。

第一是对“迁出地”的影响。正面影响包括:(1)迁出会减少当地人口和劳动力数量,在原有自然资源(耕地、草场等)和其他就业机会总额不变的条件下,减轻人口对土地资源的压力和当地就业机会的竞争。(2)如迁出人员把在外劳动的收入转回留给迁出地的亲属,将增加当地人口的收入。(3)如果外出人口带回务工的资金积蓄、经营经验和其他信息资源回乡创业,会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大量年轻劳动力的外流,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1)改变“迁出”社区的人口结构,使“老弱病残”人员比例上升,造成劳动力短缺,耕地撂荒,农业生产及粮食供应受到影响。(2)如家庭部分人员(单身、夫妇)长期外出务工,会给留守家乡的其他人员带来社会问题,如夫妻长期分居易造成婚姻破裂,父亲或双亲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的抚养及教育问题,“留守”老人的照顾与赡养等。(3)政府对这些长期外出人员的管理工作(计划生育、子女义务教育、婚姻登记等)很难有效开展与落实。

第二是对“迁入地”的影响。(1)人口迁入会增加迁入地的人口和劳动力规模,特别是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迁移,会向城市各行业提供年轻、工资较低的劳动力,改善已出现“老龄化”趋势的城市人口年龄结构。(2)大量农民工和家属迁入城市打工定居,对城市的住房和就业市场会带来一定冲击,对城市原有的公共设施(学校、医院、公共交通、娱乐设施和垃圾处理等)和自然资源(土地、淡水、能源等)造成一定压力。(3)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在对城市各项设施造成压力的同时,自身

也是不可忽视的消费力量,特别是低端服务业主要以城市贫民和农民工为对象。(4)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强,也给城市的治安管理带来一定困难,使城市中的犯罪案件(抢劫、偷盗、卖淫、吸毒、贩假和暴力斗殴等)有所上升。(5)在一些城镇形成来自同一地区、同一族群聚居的流动人口“新社区”,由于保有原籍地的文化传统、族籍和从事相近的低收入工作,这样的“新社区”很容易形成与城镇居民不同的“认同意识”,很容易因文化差异和身份区隔而出现矛盾与冲突。

第三是对迁移者自身的影响。由于迁出地和迁入地在经济结构、人口构成、社区生活、文化形态(语言方言、宗教信仰等)以及消费模式等方面可能存在较大差异,移民在来到迁入地后必须对自身进行“调适”,以适应并融入迁入地的城市社会中。(1)移民很可能从事与原居住地形式和内涵都十分不同的工作,改变原有的劳动习惯和观念。(2)移民的居住模式、生活方式会有很大改变。(3)移民的社会联系与信息网络将发生很大变化。(4)在新的工作岗位和生活环境中,移民将会学习许多新的观念、知识技能和社会交往方式,在家庭婚姻观、就业观、人生观等方面完成转变。以“农村—城市”移民为例,自身的“调适”将使进城农民逐步完成向城镇居民的转变。

社会学关于人口迁移的调查研究,有的以迁入地为实地调查的地点,通过对移民和本地居民的比较,分析两部分人员之间是否存在“社会分层”方面的结构性差距,从而理解移民是否平稳地融入迁入地社会。有的研究以迁出地为调查地点,通过对移民和留守居民的比较,分析“迁移选择性”(migration selectivity)和两部分人员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从而分析“谁会迁移”以及迁移对迁出社区带来的影响。

二、关于调查地点

我们的调查地点是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两个苏木(乡)下属6个嘎查(行政村)的26个自然村。赤峰市原名昭乌达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南面与河北接壤。赤峰市的南部旗县在历史上曾属于“热河省”,以农业为主,北部旗县则以畜牧业为主,蒙古族是北部牧区的主要居民。翁牛特旗位于赤峰市的中部,从人口的民族构成和经济活动类型等指标来看,是典型的农牧交错和蒙汉混居的交界地带,是一个研究农牧业关系、蒙汉关系的理想地点。在这6个嘎查中,最

东面的一个嘎查(下属 5 个自然村)以牧业为主,村民主要是蒙古族,其余 5 个嘎查则属于半农半牧、蒙汉混居模式。对这些村落的调查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地农牧业的发展趋势与蒙汉关系的发展趋势。

这 6 个嘎查下属的 26 个自然村在地理上连成一片,位于县城乌丹镇的东面。其中距离县城最近的村子只有 5 公里,最远的村子约有 23 公里。1985 年我们调查时,各村之间只有弯曲的土路,2005 年各嘎查与县城之间都修建了沙石路,从县城到赤峰市区约 90 公里,有标准的柏油路。赤峰市有火车站,向东通往通辽市,从通辽市可通向沈阳市和长春市;往南到北京,从北京可前往全国各地。交通条件的改善,为村民外出务工提供了便利。

2005 年的问卷调查是笔者 1985 年在这 26 个自然村进行的问卷调查的跟踪调查。在这 26 个自然村中,1985 年有正式户籍的村民为 1 855 户,当时大致按照每 3 户调查 2 户的等距抽样方法,共抽取了 1 386 户,在进村以后的实际户访中完成了 1 152 户的问卷调查,为全体农户的 62.1%。那些抽样选到而没有实际访到的农户,大多是调查时期不在村中的外出人员和寄居外地儿女或亲戚家的老人户,在社区里通常被认为是“边缘”村民。从样本的整体规模和实际完成调查户的比例来看,1985 年调查所获的信息和数据,可以代表当地村民的基本情况。

2005 年 7 月,我们再次来到这 6 个嘎查的 26 个自然村进行以农户家计与人口流动为主题的问卷调查,调查组由笔者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 6 名研究生组成。¹这次确定的户访调查名单,依据的是笔者 1985 年在这些村落进行的抽样调查名单,笔者希望能够对 20 年前调查过的这些农户进行再调查,以便进行 20 年变迁的比较研究,分析当地农户在经济活动、人均资源、收入与消费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令笔者感到幸运的是,20 年前在 26 个自然村中调查的 1 152 户当中,我们仍然追踪到了 865 户(占 75.1%),其余 287 户(占 24.9%)已经整户迁走或成为绝户(无子女,老人去世后户籍注销)。这个比例也反映出当地农民的户籍变迁状况,虽然村落中总户数在增加,但约有 1/4 的户“消失”了。

由于有些原被访户的子女们在成家后,大多分家新立门户。考虑到原被访户主整体偏年迈,为了在年龄结构上多少有些平衡,笔者又从原被访户分出新立的户当中选取 23 户进行了调查,所以 2005 年的调

1. 参加这次户访问卷调查的有博士生陈彬莉、栗晓红、葛婧和硕士生杨帆、杨海明、李若愚。

查总户数为 888 户。在这 20 年期间,部分被访户的的老人已经去世,转由成年子女注册为户主,而原来一些未婚子女多、人口规模较大的户,由于子女在婚后自立新户也缩小了人口规模,这些变动反映出 20 年间农户在“生命史”(life circle)过程中的自然演变。

以上介绍的是 20 年前被访户样本的选取和追踪方法,这样的选取结果有可能使这次被访户仍然整体年龄偏大,可能导致这些被访户外出打工的劳动力比例偏少。由于笔者没有 2005 年 26 个自然村全体村民的年龄结构数据,故无法准确判断这次调查样本是否存在年龄偏大以及差别程度的问题。这是我们在理解数据分析结果时需要注意的。

三、被访户外出务工人员的基本情况

本文关注的主题是当地农户的外出打工情况,以下是外出务工人员的基本特征。

(一) 外出务工户在村民中的比例和外出务工人员规模

被访户中超过半数(53.2%)有成员外出务工(见表 1),不少被访户(18.1%)派出了两个或以上成员在外务工。结合表 2 中各户人口规模情况,可以看到“四口之家”在总户数中所占比例最大(29.8%),有 60 户的规模在 7 人~10 人。这样大的“户”在城市里是极少的,反映出当地农村的生育率水平较高,夫妇大多生育两个以上子女,同时一些子女成年后仍然没有和父母分家。据说当地基层政权还是“比较严格”地在汉族中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但是我们在户访中经常可以看到生育 2~3 名子女的汉族夫妇和生育 3~4 名子女的蒙古族夫妇。在我们的调查户中,人口规模大的农户几乎都有成员外出务工,这与其他学者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蔡昉,2007:68)。

表 1:被访户外出打工人数分布

各户外出打工人数	户数	%	合计人数	占打工总人数(%)
0	416	46.8	416	0.0
1	311	35.1	311	47.0
2	133	14.9	266	39.8
3	24	2.7	72	10.8
4	4	0.5	16	2.4
共计	888	100.0	665	100.0

表 2: 被访户人口规模分布

各户总人数	户数	%
1	13	1.5
2	125	14.1
3	172	19.4
4	265	29.8
5	160	18.0
6	93	10.5
7	28	3.2
8	28	3.2
9	1	0.1
10	3	0.3
共计	888	100.0

全体被访 888 户的总人口为 3 656 人,其中 472 户有成员外出,外出打工总人数为 665 人,占全体被访户总人口的 18.2%。这一比例看起来似乎并不很大,但考虑到这些外出务工人员绝大多数是年轻力壮的成员,留在村中的主要是老人、儿童和在校学生,这样估算起来外出人员在当地全体劳动力中所占比例应当在半数左右。我们在村中访问时,很少看到 16 岁~26 岁的初高中毕业生,而在户访时则可以记录到他们外出务工的各项情况。其他学者在江西万载县的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家庭有 45% 的劳动力外出打工,而该县整体上有 25% 的外出打工者比例(墨菲,[2002]2009:58)。中国不同地区的自然资源状况和劳动力外出的风气各不相同,人口密度大、与城镇或开发区距离近的村落通常有较大比例的劳动力外出务工。

(二) 外出务工人员的结构性特点

表 3 对被调查的外出务工人员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统计归纳,从性别上看,3/4 的外出务工人员为男性。未婚的年轻男性和女性大多外出务工,而在已婚并生育的年轻夫妇中,大多是男性外出务工,留下妻子在家照看儿童和老人。其他在“迁入地”的流动人口调查也反映出务工者中男性与女性比例的不同结构,如在北京等 5 个城市的流动人口中,男性占 63.4%~74.4%,女性占 25.6%~36.5%(魏津生,2002:87),重庆市调查的 8 880 名流动人口中,男性占 58.5%,女性占 41.5%(张宗益等,2007:65)。务工者的性别比例实际上显示的是不同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外来劳力需求的性别比例。

在我们 2005 年调查的 888 户中,汉族户主有 533 户(60%),蒙古族户主 344 户(38.7%),满族户主 10 户(1.1%),其他 1 户(0.1%)。在汉族 533 户中,外出 366 人,每户平均外出 0.69 人;蒙古族 344 户中,外出 286 人,每户平均外出 0.83 人。可以说,外出人员在汉族农户和蒙古族农户中所占的比例之间可能存在一定差距,我们通常的印象总认为汉族外出务工要比蒙古族更踊跃,但从这一地区的调查数据来看,似乎蒙古族对外出务工更为积极。

表 3:外出务工者的基本情况及其收入

	人数	%	平均月收入(元)
性别:男	498	74.9	1011.42
女	167	25.1	606.93
总计	665	100.0	
民族:汉族	366	55.0	936.86
蒙古族	286	43.0	876.50
满族	12	1.8	950.00
其他	1	0.2	400.00
总计	665	100.0	
教育:文盲	4	0.6	837.50
小学	173	26.0	824.08
初中	398	59.8	881.76
高中	63	9.5	962.86
中专	12	1.8	958.33
大专	4	0.6	5500.00
本科	11	1.7	1300.00
总计	665	100.0	910.29

如果把户主的民族成分与打工者的民族成分排成交互表(见表 4),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户主民族成分”为汉族的农户派出了 22 名本人成分为蒙古族的打工人员,与之相比,我们没有发现以蒙古族为户主的农户派出汉族打工者。需要指出,这并不能说明当地蒙汉通婚模式主要是汉族男子娶蒙古族妻子,而蒙古族男子很少娶汉族妻子,而恰恰表明我国民族政策的社会影响。在我国实行的各项民族优惠政策(包括可以多生孩子、学校入学考试加分、招工提干优先等),使具有少数民族成分的公民在许多领域享受优惠待遇。这些政策在客观上导致蒙汉通婚所生子女几乎无例外地都申报为“蒙古族”,所以汉族家庭娶进蒙族媳妇,子女申报为蒙古族,中学毕业后外出务工,就出现了表 4 中的情况,即汉族家庭派出蒙古族务工者。而当蒙古族家庭娶进汉族媳妇后,出生的子女依旧申报为蒙古族,因为外出人员多

为未婚青年,汉族媳妇留居在家,所以户主为蒙古族的农户一般不大可能派出“汉族”打工者。表 5 显示超过半数(51%)的外出务工者的年龄在 16 岁~25 岁之间,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应当是未婚者。

表 4:各户户主和外出务工人员的民族成分分布

打工者 民族成分	户主民族成分				合计
	汉族	蒙古族	满族	其他	
汉族	257	0	1	0	258
蒙古族	22	181	1	0	204
满族	2	1	6	0	9
其他	0	0	0	1	1
总计	281	182	8	1	472

表 5 显示也有一定数量(6.8%)的打工者年龄在 45 岁以上,这些人绝大多数是男性。在调查中访谈到的 15 岁以下外出者,大多是去“给亲戚帮忙”或是“学徒”,在农村里这种情况有时可以碰到。

表 5:外出务工者的年龄分布

年龄	汉族	%	蒙古族	%	共计	%
13-15	10	2.7	3	1.1	13	1.9
16-20	87	23.8	65	22.7	156	23.5
21-25	87	23.8	91	31.8	183	27.5
26-30	39	10.6	43	15.0	85	12.8
31-35	57	15.6	24	8.4	82	12.3
36-40	35	9.5	24	8.4	59	8.9
41-45	27	7.4	15	5.2	42	6.3
46-50	5	1.4	10	3.5	15	2.2
51-55	10	2.7	7	2.5	17	2.6
56-60	4	1.1	2	0.7	6	0.9
>60	5	1.4	2	0.7	7	1.1
总计	366	100.0	286	100.0	665*	100.0

注:*总计 665 人中包括了 12 名满族和 1 名壮族。

表 5 中汉族与蒙古族外出务工者的年龄结构差别不大,汉族 15 岁以下和 31 岁~35 岁组的外出比例比蒙古族要稍高一些,蒙古族主要集中在 16 岁~30 岁之间。这与 2000 年人口普查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年龄构成分析结果大致相近。以男性为例,55.1%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集中在 15 岁~29 岁,但是 14 岁以下人员的比例高达 10.6%(黄荣清等,2004:185),可能南方少数民族的流动人口年纪偏小,不少孩子随父母来到打工城市居住。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外出打工者的主体是未婚青年,带孩子一起外出的现象并不常见。

从外出务工人员的受教育情况看,初中毕业生是主体(59.8%),这

是我国农村多年来积极推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成果,其次是小学毕业生(26.0%)和高中生(9.5%)。受过一定的学校正规教育是城镇就业市场上对求职者的基本要求,如果不会识字和计算在许多行业里是无法工作的,这是我国近十几年来上亿农民工得以进入城镇和沿海开发区务工的重要前提条件。

在这 665 名“外出人员”中,还有 11 名大学毕业生和 4 名大专毕业生,他们加在一起占了总数的 2.3%。这些人员已经成为城镇常住居民,也是本地农村与城镇的重要联系纽带。

在表 6 中,我们把 665 名外出务工人员按照性别和民族成分进行分组分析。表中数据显示,无论是汉族还是蒙古族,女性接受教育程度要高于男性,汉族女性初中毕业比例明显高于汉族男性,而蒙古族女性高中毕业比例高于蒙古族男性。在笔者访问的家庭中,女孩如愿意读书,家长通常愿意支持,同时较早希望男孩可以就业挣钱。其他学者在江西万载农村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所有的年龄组,女性的受教育水平都低于男性”(墨菲,[2002]2009:93)。在农民的性别观念上,南方与北方可能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别。

表 6:外出务工人员的民族、性别和教育程度情况

教育水平	男				女			
	汉族		蒙古族		汉族		蒙古族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文盲	2	0.7	2	1.0	0	0.0	0	0.0
小学	76	26.8	52	25.5	16	19.5	26	31.7
初中	172	60.6	122	59.8	56	68.3	39	47.6
高中	25	8.8	20	9.8	7	8.5	10	12.2
中专	3	1.1	3	1.5	0	0.0	6	7.3
大专	2	0.7	1	0.5	1	1.2	0	0.0
本科	4	1.4	4	2.0	2	2.4	0	0.0
共计	284	100.0	204	100.0	82	100.0	82	100.0

同时,表 6 也显示,在这个半农半牧区蒙古族的教育水平与汉族没有明显差异。从男性来看,蒙古族的小学和初中的比例比汉族略低一点,但是高中和大学比例又比汉族高一点。蒙古族女性的受教育情况偏在两头,一头是小学毕业的比例高于汉族,中间的初中比例低于汉族;另一头是中专比例明显高于汉族。赤峰的卫生学校(中专)招收蒙古族女生,这可能是造成蒙族女中专生多的主要原因。

(三) 外出务工人员在各户中所占比重和组合形式

在全体被访户(888 户)中,有 416 户(46.8%)无人外出,同时有 11

户是全户外出务工,他们的情况是由已分家另过的兄弟或父母提供,另有 27 户全家有半数以上人员外出务工(表 7)。由此可见,外出务工在这一地区的农村已经成为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也成为过半数农户的重要收入来源。

表 7:外出劳力占全户人数比例和占全体被访户的比例

外出劳力占全户人数(%)	户数	占全体被访户(%)
0	416	46.8
10 - 20	104	11.7
21 - 30	125	14.1
31 - 40	132	14.9
41 - 50	73	8.2
51 - 60	7	0.8
61 - 70	13	1.5
71 - 80	7	0.8
100	11	1.2
总计	888	100.0

在所有被访户中,有 161 户派出两人或以上人员外出务工,这些外出人员的相互关系大致可归纳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夫妇共同外出,有 31 户,占 19.3%;第二类是兄弟姐妹外出,有 83 户,占 51.6%,但他们通常并不集中在同一个地点;第三类是父子、翁婿、父女两代人外出,有 47 户,占 29.2%,有时也不在同一个地点。由此可以看出,根据各户人口年龄结构的具体情况,他们把本户最适合外出的劳动力派到外地务工。

(四) 外出打工地点的地区分布和外出务工时间

由于各村通往县城均有公路,到了县城又很容易转到赤峰市(地区专署所在地),然后从赤峰既可以南下北京,也可以向东去东北三省。表 8 是这 665 名外出务工者的具体就业地点。辽宁省是本地外出务工者相对最集中的地方(17.4%);其次是北京(15.3%),本乡的短工(建房子、做木匠等)和县城务工排在第三位(11.4%)和第四位(11.3%),这四个地点就集中了全体外出务工者的 55.4%。值得注意的是,本地也有 19 人去了较远的南方各城市,说明本地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地域处在不断扩展之中。这一结构也展示了中国农村跨地域流动的特点:一部分人集中在距离不远、交通便利的城市;另一部分人则随机缘散落在全国各地。

从这次调查来看,本地外出人员中有一些人是长期在外,另一些人是近期才开始外出,而且属于“季节工”的性质。如赤峰地区砖瓦厂很多,吸收了不少农村剩余劳动力,但砖瓦厂每年主要是春季和夏季运

表 8:外出打工地点的地区分布

打工地点	人数	%	平均月收入(元)
本乡(苏木)	76	11.4	771.18
本旗其他乡(苏木)	52	7.8	801.15
县城	75	11.3	772.70
赤峰其他旗县	9	1.4	877.78
赤峰市区	60	9.0	916.67
内蒙其他地区	63	9.5	1259.52
河北	48	7.2	744.79
北京	102	15.3	874.90
辽宁	116	17.4	914.61
天津	11	1.7	945.45
山西	3	0.5	1366.67
吉林	5	0.8	830.00
山东	7	1.1	1014.29
江南城市	19	2.9	1307.89
其他*	19	2.9	1407.89
共计	665	100.0	

注: * “其他”包括地理距离较远的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黑龙江等。

转,冬天停窑,在这些砖瓦厂做工的人每年只去 7~8 个月。表 9 显示有 27.7% 的外出人员在外面打工超过一年。根据工作地点和就业工作的性质,本地外出人员大致可分为“短期季节工”和“长期工”两大类。前者每年有部分时间在家乡,可以参加家里承包农田的部分劳动;后者则常年在外,通常仅在春节期间才短期回家探望,正是这部分人构成了每年“春运”的主要服务对象。

表 9:外出务工的时间

申报打工时间(月)	人数	%
1-6	254	38.3
7-12	226	34.0
13-18	91	13.7
19-24	85	12.8
24 以上	8	1.2
共计	664*	100.0

注: * 有 1 名被访者没有申报打工时间。

段成荣等人(2008:33)根据人口调查的数据计算,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 1 年以内的比例从 1987 年的 18.4% 增加到 2005 年的 21.4%;居住时间在 1 年~2 年的比例从 1987 年的 17% 增加到 2005 年的 18.4%,2005 年有 31.3% 的流动人员在外居住 5 年以上。与全国统计数字相比,笔者在赤峰调查的外出务工人员,仍有较大比例是 6 个月以内的短期“季节工”。从访谈中得到的印象是本地外出务工成为普遍现象的时

间并不久,也许还处在“初级阶段”,常年在外地,且带有“定居”倾向的打工者还很少。另从北京市、江苏省和广东省等“迁入地”的调查结果看,有相当多的农民工在这些城市已经居住了5年以上。

(五) 外出务工人员所从事的具体工作

表10罗列了这些外出务工人员所从事的具体工作,有超过半数的人员从事的是多少带有技术性的工作(如住房装修、厨师、修理工、建筑工等),可以说劳动力市场上需要什么职业,他们就去从事什么职业,其中部分上进心较强的人就会在工作中学习和提高,以求逐步改善自己的境遇和提高竞争能力。我国农民工的就业完全是市场导向和由市场机制来调节的。

表 10: 外出务工人员从事的工作及其收入

具体工作	人数	%	平均月收入(元)
砖瓦厂粗工	68	10.2	850.74
技工	337	50.7	907.03
服务业	98	14.7	652.42
矿工	30	4.5	1361.67
牧工	8	1.2	507.50
经商	24	3.6	1900.00
行医	4	0.6	800.00
财会人员	3	0.5	1083.33
当兵	3	0.5	606.67
教师	3	0.5	1266.67
企业职工	4	0.6	1250.00
其他	83	12.5	845.73
共计	665	100.0	910.29

“雇佣关系”是我们在流动人口研究中所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在665名外出务工人员中,绝大多数(87.5%)是给别人当“雇工”的“打工仔”,这是外出务工人员的主体;另有9.2%的人是经商人员(修理店、个体医生、自己有车跑运输等),见表11。

表 11: 外出务工人员的雇佣关系及其收入

雇佣关系	人数	%	平均月收入(元)
当雇工	582	87.5	881.90
自己经营	61	9.2	1335.83
帮亲戚	2	0.3	150.00
学徒	9	1.4	266.67
随配偶	3	0.4	250.00
单位招收	8	1.2	946.25
共计	665	100.0	910.29

四、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情况

农村人背井离乡外出务工,最主要的动力就是在外边多挣到一些收入。由于农村普遍的高生育率和扩展耕地、水源等方面所受到的自然限制,农村人均耕地在不断下降,许多年轻人中学毕业后留在家里无事可做,这些中学毕业生的年龄多在 16 岁~20 岁间,他们的父母大多在 40 岁左右。在这些学生读书期间,家里就不需要他们在农业生产上帮忙,毕业后同样不需要,因此外出务工是他们争取收入、帮助家庭以及锻炼自己的唯一选择。而挣到钱,能挣到多少钱,是农户和务工人员选择从业地点和评价务工效益的主要指标。

在问卷中,笔者对其中一些农户的外出收入和支出情况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询问,如一些在餐馆、旅店做服务员的人员,据家人讲,她们的月收入为 500 元~600 元,由雇主“管吃住”,其月收入的数字与我们在其他地区调查的结果十分接近。

学者开展的入户社会调查通常不可能精确地掌握农户外出务工的收入信息,即使是被访者自己,有时也对本户成员的收入情况记不太清楚。无论是收入还是支出,有些数字多少会存在遗漏或估计的情况,能够把各项收入和开支都记得十分清楚的精明农民在中国农村并不太多。但入户访谈得到的数据多少还是给我们一个大致的收入水平,有助于我们了解农民工和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情况。

(一) 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分组

表 12 显示每月 750 元~1 000 元是规模最大的收入组(31.4%),其中 250 元可以说是一个月收入的底线,少于这个数目的主要是学徒工。从累计百分数来看,79.2% 的打工者月收入在 1 000 元以下,他们是打工者的主体。在 24 名“经商者”中,月平均工资在 1 900 元(见表 10),所以表 12 中月收入在 2 000 元以上的 17 人,都属于这个群体。

有 170 名务工者申报在外面没有任何“消费支出”。这些人都是在服务业(旅店、餐馆等)就业并由雇主提供免费食宿的人员。另有 126 人的月支出在 100 元以下,有些行业(如施工队、修理厂、砖瓦厂等)组织集体开伙,工人交纳较少的“伙食费”。表 13 显示有 86.4% 的外出务工者月消费支出在 300 元以内,对比表 12 中的收入情况,可以估算出他们在扣除在外消费后能够带回家的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如以月

表 12: 外出务工人员月收入分组

申报月收入(元)	人数	%	累计%
0	5	0.8	0.8
100 - 250	12	1.8	2.6
251 - 500	132	19.9	22.5
501 - 750	168	25.3	47.8
751 - 1 000	208	31.4	79.2
1 001 - 1 500	87	13.1	92.3
1 501 - 2 000	34	5.1	97.4
2 001 - 2 500	5	0.8	98.2
2 501 - 3 000	6	0.9	99.1
3 001 - 4 000	4	0.6	99.7
>4 000	2	0.3	100.0
总计	663*	100.0	

注:*有 2 名被访者没有提供收入数据。

收入 1 000 元,月消费 300 元计算,每月可以节余 700 元。如果一年外出 8 个月,总数就是 5 600 元。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4 年全自治区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为 2 464.89 元,牧民人均年纯收入为 3 571.19 元,翁牛特旗农牧民人均年纯收入为 2 156 元(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2008:253 - 254,688)。把务工人员的收入与本地农牧民平均收入相比较,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对当地农户的收入来说,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来源,这也是农民外出务工的主要动力。

表 13: 外出务工人员月消费支出分组

申报月支出(元)	人数	%	累计%
0	170	25.6	25.6
1 - 100	126	19.0	44.6
101 - 200	180	27.2	71.8
201 - 300	97	14.6	86.4
301 - 400	27	4.1	90.5
401 - 500	26	3.9	94.4
501 - 600	15	2.3	96.7
601 - 700	4	0.6	97.3
701 - 800	4	0.6	97.9
801 - 1 000	8	1.2	99.1
>1 000	6	0.9	100.0
总计	663*	100.0	

注*2 名打工者没有提供消费支出数据。

在 881 户申报的全户 2004 年总收入中,15.2% 被访户的收入中,有半数及以上来自外出务工;29.4% 的被访户,其收入有 30% 及以上来自

外出务工;近 40% 的被访户,其收入有 20% 及以上来自外出务工(见表 14)。由此可见,外出务工收入对许多农户的日常生活已是不可或缺。在 2004 年内蒙古全区农牧民人均年纯收入的 2 606.37 元中,“外出从业收入”仅为 162.43 元(6.2%)(同上,2008:360),翁牛特旗调查地点的农牧民由于地理位置邻近县城,交通便利,外出打工的普遍性和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显著高于全区平均水平。

表 14: 打工收入占全户 2004 年总收入比例

外出打工收入占全户总收入(%)	户数	%	累计%
0	425	48.2	100.0
1 - 10	37	4.2	51.8
11 - 20	70	7.9	47.5
21 - 30	90	10.2	39.6
31 - 40	72	8.2	29.4
41 - 50	53	6.0	21.2
51 - 60	48	5.4	15.2
61 - 70	31	3.5	9.8
71 - 80	22	2.5	6.3
81 - 90	18	2.1	3.8
91 - 100	15	1.7	1.7
总计	881*	100.0	

注:*另有 7 户没有提供收入数据。

其他学者在甘肃 10 个村落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有 28 岁及以下外出打工者的家庭总收入中,“打工收入”平均占 61.2%;在有 28 岁以上外出打工者家庭总收入中,“打工收入”占 55.3%(张永丽、黄祖辉,2008:81)。这些数字明显高于笔者在内蒙古调查地点“打工收入”在农户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由此可见,全国各地区农村经济条件与外出务工情况存在很大差别,发展水平很不平衡。

(二) 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

我们根据外出务工者的不同分组,计算出了各组人员的月平均收入。为了节省文章篇幅,我们已把这些计算结果列在前面各表当中。

1. 性别差距

男性外出务工人员的月平均收入为 1 011.42 元,女性为 606.93 元,女性平均收入为男性的 60%。这与不同性别外出所从事的具体工作性质相关,女性大多在低报酬的服务行业,主要集中在商店、旅店和餐馆当服务员;而男性一般从事重体力劳动(在砖瓦厂、煤矿、建筑施工

队)或带有一定技术的工作(木匠、修理工等),其收入相对比服务业要高一些。我们在户访中没有听到对性别收入差异的抱怨。

2. 民族差距

在一个蒙汉混居地区,人们通常都会关心在外出务工的行为模式和收入水平方面是否存在族际差异,即“民族身份”是否成为影响农民外出和收入的因素。为此我们在表3中统计出了各族外出务工者的平均收入。汉族外出务工者平均月收入为936.86元,蒙古族外出务工者为876.50元。由于汉族中有几个经商人员的收入很高(两个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的商人都是汉族),这就把汉族的平均收入拉高了。一般来说,在这个调查地点的户访中,笔者发现蒙汉两个群体之间在平均收入水平上存在差距,但差别幅度并不大,每个个体之间的职业差别则是导致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3. 具有不同教育背景群体之间的差距

在本次调查中,“受教育水平”是按照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和本科这一顺序来编码的。除了4个年纪较大的“文盲”(木匠),平均收入(837.50元)稍高于小学毕业生(824.08元)之外,收入水平大多是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提高(见表3),值得注意的是大专生平均月收入(5500元)显著高于大学本科生(1300元)。这是因为有些大学本科生毕业后的工作是教师或事业单位职工,收入并不太高,而大专生通常有一定的技术专长,是企业急需的技术人才,收入较高。从这一数据也可看出,目前劳动力市场对大专生的需求明显超过了大学本科生。

4. 不同务工地点之间的差距

从表8中提供的数据来看,似乎不同的务工地点对务工人员的收入影响并不显著。在被归为“其他地点”的19人和去“江南城市”的19人以及“内蒙其他地区”的63人中,有些是散在各省的经商人员,所以其月收入分别为1407.89元、1307.89元和1259.52元。在山西务工的3个人都是矿工,下井工作辛苦而且有危险,平均月收入为1366.67元也很正常。以上几组的收入比其他地点稍高一些,其他地点的务工人员收入都在744~945元之间。所以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差距主要体现在个体差异上,务工地点并不是重要因素。

5. 具体从事工作之间的差距

比较明显的是“经商人员”的月平均收入最高(1900元),其次是矿

工(1 361.67元)(见表 10)。占据第三位和第四位的职业是教师(1 266.67元)和企业职工(1 259元),这些主要是大学毕业生。在所有外出务工人员中占 50.7%的“技工”,其月收入为 907.03 元,几乎等同于全体人员的整体平均收入(910.29 元)。“服务业”的平均月收入为 652.42 元,属于收入偏低的工作。在本乡为他人当“牧工”的月平均收入也偏低(507.50 元),但劳动强度低,离家近,也有其他方面的好处。总之,从事不同性质的工作对收入水平有影响,但除了经商人员的收入较其他职业为高以外,大多数工作收入的差距并不悬殊,而且被访者对这样的差距都坦然接受。

6. 雇佣关系对收入的影响

“自己经营者”在表 11 中的各类人员中是月平均收入最高的(1 335.83元),其次是“单位正式招收的职工”(946.25 元)。“雇工”是各类雇佣关系中人数最多(占全体务工人员 87.5%)的一类,月平均收入为 881.90 元,接近全体月平均收入(910.29 元)。那些“帮亲戚”和“学徒”的月收入通常只有 100 元~300 元,有时甚至“管吃住”后就不给报酬,这些雇佣关系比较特殊,而且人数也很少。

7. 几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教育水平”是定序变量,“民族成分”¹虽然应当属于定性变量,但在排除其他群体只保留两个群体的情况下,是可以当作定序变量来看的,“性别”也是如此。所以本文把这个变量和两个定距变量(年龄、月收入)一起做了以下双变量的相关系数分析(见表 15)。

汉族外出打工者 365 人,平均月收入 936.86 元;蒙古族打工者 286 人,平均月收入 876.50 元,差距为 60.36 元。“民族”与“月收入”的相关系数值很小(-0.036),没有统计显著性。表 15 中有统计显著性的只有三个系数:外出务工的男性年龄一般比女性大,男性收入一般比女性高,教育程度高的比教育程度低的收入高。这三点与表 3 中分组的平均收入比较的结果是一致的,而且相比之下,表 3 的分组数据更能够说明每个具体分类中各组的收入差别。

笔者在这 26 个村落里进行户访调查时,发现许多家庭都有电话或

1. “民族成份”在本次调查中的编码方法为:汉族为 1,蒙古族为 2,满族为 3,其他为 4。由于被访户中满族和其他民族只有 13 人,所以在相关分析计算中被排除。

表 15:汉族、蒙古族外出务工人员部分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性别	出生年	教育	民族	月收入
性别	Pearson Correlation	1	.105**	.044	.072	-.213**
	Sig. (2-tailed)		.007	.258	.067	.000
	N	652	652	652	652	651
出生年	Pearson Correlation	.105**	1	.021	-.030	-.051
	Sig. (2-tailed)	.007		.594	.444	.192
	N	652	652	652	652	651
教育	Pearson Correlation	.044	.021	1	.017	.193**
	Sig. (2-tailed)	.258	.594		.668	.000
	N	652	652	652	652	651
民族	Pearson Correlation	.072	-.030	.017	1	-.036
	Sig. (2-tailed)	.067	.444	.668		.363
	N	652	652	652	652	651

注:** $p \leq 0.01$. (2-tailed)。

表 16:外出务工户的通讯条件

	电话(门)				手机(部)						电视机(台)			
	0	1	2	小计	0	1	2	3	4	小计	0	1	2	小计
户数	531	348	2	881	553	298	21	7	2	881	57	759	68	884
%	60.3	39.5	0.2	100.0	62.8	33.8	2.4	0.8	0.2	100.0	6.4	85.9	7.7	100.0

手机,有些外出务工子女较多的家庭甚至有 4 部手机,每个务工者都有 1 部(见表 16)。通讯条件的改善与便利,是农民家庭愿意让年轻人出去打工的重要条件,一是家里有什么事,马上可以通知到在外地务工的子女,如有需要,几天内就可返家;二是家里也可通过电话了解在外务工子女的情况,父母比较放心。在所访问的农户中,40%的家庭安装了电话,37%的成员有手机,这与外出务工户在全体被访户中的比例(53.2%)相近。当地农户之间联系很多,许多还是亲戚关系,笔者在户访中多次见到邻居来借用电话的现象。通讯条件的改善对促进这一地区的农民外出务工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这些村落的农户中,电视机十分普及,只有 6.4%的被访农户家里没有电视机,几十个频道的电视节目是当地农民了解外面世界的重要信息渠道,许多年轻人通过电视节目了解城市生活和城市就业情况,认识到外面有一个充满各种机会的“新天地”,他们也因此愿意出去“闯世界”,在那里寻找自己的人生目标。

五、结论

从笔者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半农半牧区 26 个自然村的实地调查

结果来看,外出务工已经成为当地农户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超过半数的被访农户(53.2%)有家庭成员在外地打工,约占当地劳动力总数的一半;被访户家庭收入很多是来之外出务工。从这个意义上看,外出务工显著地减少了当地人口对农业资源的压力,提高了农民收入。

笔者发现 53% 的打工者家里有 2 人或以上的人在外地务工,其中有些以夫妇、兄弟、姐妹、父子等组合方式来彼此照应,一定程度上维系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减少了感情隔阂的产生。由于有 1/3 以上的打工者在外时间不超过 6 个月,绝大多数打工者春节都会回家团聚,这也有效降低了因打工期间彼此分开可能带来的对家庭关系的影响。

作为蒙汉混居地区,当地的蒙古族年轻人都掌握了汉语,也熟悉汉族的文化与习俗,因此民族因素没有对他们外出务工带来任何不利影响,蒙古族和汉族的打工者之间在收入水平方面没有明显差距。在唯一的牧业嘎查户访时,笔者仅在家里只有老人时才需要翻译协助,与中青年交流是没有问题的。在其他农业嘎查的蒙古族居民,其汉语水平甚至普遍超过蒙古语。可以说,当地的蒙古族和汉族文化已在一定程度得以融合,两个民族的居民之间也相处得十分融洽,族际通婚也比较普遍。

在影响外出打工者收入的因素当中,男性之所以平均收入高于女性,主要是与不同性别从事的具体工作有关,而受教育水平是影响打工者收入的重要因素,这与我们在各城市“迁入地”的流动人口的调查结果完全一致(马戎、旦增伦珠,2006:160)。在此次调查中,仍然有 26.6% 的外出务工人员的教育水平是小学和文盲。随着全国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实施和高中教育的发展,我们相信未来的农民工的教育水平会有一个明显的提高,这对提高他们的收入必然带来正面的影响。

在户访中,笔者还发现这些村落的外出务工人员有近 1/3 是 2005 年首次外出的,农民们让中学毕业的年轻人去外地务工也是一个逐步被人们所接受的现象。在中国近 30 年的体制改革过程中,在乡镇企业和私营经济发展最早的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广东、山东等沿海省份的农民,出现了第一波脱离土地的“农民工”在乡镇企业和“开发区”就业,随后安徽、湖北、江西、湖南、河北等邻近沿海省份的青年农民也开始向沿海省份和大城市流动,来自四川、河南、内蒙古、甘肃等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大概可以归为第三波。笔者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赤峰地区调查时,当地农民外出务工只有很小的规模,且集中在本旗县的砖瓦

厂,至 2005 年外出务工已发展为普遍的现象,就业地点已扩展到东三省和长江以南。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城乡经济和体制改革的“梯度推进”,农民工的“迁出地”首先是沿海地区,再蔓延到中部,然后再到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笔者 2007 年在新疆南部喀什地区也看到了当地维吾尔族青年远赴沿海地区务工的现象(马戎,2007)。纵观 30 年的演变,打工潮“发源地—目的地”的地理发展轮廓还是比较清晰的。

表 17:人口流动的类型及其说明

常住居民		人口流动类型			
迁出地居民	迁入地居民	流动人口(不涉及族际交往)	流动人口(涉及族际交往)		
A. 汉族为主	D. 汉族为主	A→D	A+B→D	C→D	B→D
B. 少数民族为主	E. 少数民族为主	B→E	A+B→E	C→E	B→F
C. 各族混居	F. 各族混居		A+B→F	C→F	A→E

根据流动人口的“迁出地”和“迁入地”各自的人口民族构成,我们可以在表 17 中把流动人口大致分为 11 大类,其中 2 类较少涉及族际交往和民族关系,另外 9 类都在一定程度上与族际交往相关。现在能够吸引一定规模流动人口的城镇或经济开发区,一般是东中部汉族聚居区和西部多民族混居的城镇。中国东部目前规模最大的流动人口是“A→D”类型,而西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多为“A+B→F”类型(如乌鲁木齐、兰州、西宁等城市);其次是“A+B→E”类型(如拉萨市)。笔者这次在赤峰调查中所涉及的流动人口,可归类于“C→D”,即从蒙汉民族混居地流动到以汉族为主的城镇。广东接纳维吾尔族务工者,其流动可归为“B→D”类型。作为一个区域发展水平不平衡的多民族国家,我们对于流动人口和农民工的研究不应该忽略其中牵涉的民族因素,“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否能够顺利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各族流动人口就业和族际交往的宏观组织和细心引导。而对各种类型人口流动情况的调查研究,则是了解和发现问题、及时调整管理制度和政策的科学基础。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蔡昉. 2007. 中国流动人口问题[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Cai Fang. 2007. *Flou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段成荣,等. 200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J]. 人口研究, (6) (Duan Chongrong, et al. 2008 "Nine Trends in Dynamics of Present Flou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Population Research* (6). (in Chinese)]

- 辜胜阻,等,主编.1994.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Gu Shengzu, et al. (eds.). 1994. *Population Movement and Urbanization in Modern China*. Hubei: Wuhan University Press.]
- 黄荣清,等.2004.20世纪90年代中国各民族人口的变动[M].北京:民族出版社.[Huang Rongqing, et al. 2004. *Changes in Popul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in the 1990s*. Beijing: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 马戎.1989.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和实现迁移的条件——赤峰调查[J].中国人口科学(2).[Ma Rong. 1989. "The Reasons and the Relevant Conditions for Migration in Chifeng, Inner Mongolia."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 (in Chinese)]
- 马戎.1995.我国小城镇的结构与进镇人口迁移[G]//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发展与文化研究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Ma Rong. 1995.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Small Towns in China and Rural-Town Migration." Pp. 36 - 69 i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China*, edited by ISA (e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马戎.2007.新疆维吾尔族农民工走向沿海城市——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劳务输出调查[J].中国人口科学(5).[Ma Rong. 2007. "Uyghur Rural Labors of Southern Xinjiang Move to Coastal Cities: A Survey on Labor Export in Shufu County of Kashgar Prefecture."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5). (in Chinese)]
- 马戎、潘乃谷.1988.赤峰农村牧区蒙汉通婚的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3).[Ma Rong and Pan Naigu. 1988. "Han and Mongol Inter-marriages in Rural Chifeng, Inner Mongolia."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3). (in Chinese)]
- 马戎、潘乃谷.1989.居住形式、社会交往与蒙汉民族关系——从赤峰调查看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J].中国社会科学(3).[Ma Rong and Pan Naigu. 1989. "Residential Patterns, Social Interaction, and Han-Mongol Relationship: The Factors Affecting Ethnic Relations from A Case Study of Chifeng."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3). (in Chinese)]
- 马戎、潘乃谷.1993.内蒙古半农半牧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府村调查[G]//潘乃谷、马戎,主编.边区开发论.北京大学出版社.[Ma Rong and Pan Naigu. 1993.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emi-Agricultural and Semi-Pastoral Areas in Inner Mongolia: A Case of Fu Village." Pp. 82 - 139 in *On Development of Frontiers*, edited by Pan Naigu and Ma Ro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马戎、旦增伦珠.2006.拉萨市流动人口调查报告[J].西北民族研究(4).[Ma Rong and Tazen Lhudup. 2006. "Temporary Migration in Lhasa City." *Northwestern Ethno-National Studies* (4). (in Chinese)]
- 马戎,等.2000.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桥头镇调查[G]//马戎,等,主编.中国乡镇组织调查.北京:华夏出版社.[Ma Rong et al. 2000. "A Study of Qiaotou Town of Wengniute Banner, Inner Mongolia." Pp. 213 - 371 in *Studies of Township Organizations of China*, edited by Ma Rong, et al. Beijing: Huaxia Press.]
- 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编.2008.内蒙古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Bureau of Statistics (compiled). 2008. *Inner Mongoli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8). Beijing: China Statistical Press.]
- 墨菲,瑞雪.[2002]2009.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Murphy, Rachel. (2002)2009. *How Migrant Labor is Changing Rural China*.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国家统计局,编.2008.中国统计年鉴(2008)[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ed.). 2008.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na* (2008). Beijing: China Statistical Press.]
-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The Project Group of Research Division of State Council. 2006. *A Report on Peasant Labor in*

China. Beijing: Yanshi Publishing House.]

Thomas, Brinley. 1968. "Migration: Economic Aspect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ume 9 and 10)*.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and The Free Press.

魏津生. 2002.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基本状况和问题[G]//魏津生,等,主编. 中国流动人口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 [Wei Jinsheng. 2002. "The Situation and Issues of Flouting Population in Chinese Cities." Pp. 76 - 105. in *Studies of Flou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edited by Wei Jinsheng et al.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尹志刚,等. 2008. 北京市流动人口移民倾向和行为研究[M]. 北京出版社. [Yin Zhigang, et al. 2008. *Migration Trends and Behaviors of Flouting Population in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张永丽、黄祖辉. 2008. 新一代流动劳动力的特征及流动趋势[J]. 中国人口科学(2) [Zhang Yongli and Huang Zuhui. 2008. "Characteristics and Movement Trends of New Generation Flouting Labors." *Chinese Journal Population Science* (2). (in Chinese)]

张宗益,等. 2007. 非农劳动力迁移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J]. 人口研究(4). [Zhang Zongyi, et al. 2007. "Migr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Affecting Factors of Non-agricultural Labors." *Population Research* (4). (in Chinese)]

邹兰春. 1996. 北京的流动人口[M]. 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Zou Lanchun. 1996. *Flouting Population in Beijing*. Beijing: China Population Press.]

责任编辑:劳 勤